



# “学奸”与“经师”的扞格

——试析章太炎、刘师培对汉宋兼采思想的评论

孙运君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 400715)

**摘要:**汉宋兼采思想勃兴于清嘉道年间,以陈澧等人代表,戊戌变法后转入伏流。自其学说之始,学界对其评价便是褒贬不一……,显者如章太炎、刘师培等批评尤烈。章氏认为陈澧属“三奸”之列,刘师培则认为陈澧兼采之学“曲相附和”、“近名”。而肯定者则有钱穆给予的“经师”之美誉。然而“学奸”与“经师”之间的“扞格”尚未引起学界关注……。学术发展至今日,已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解读,或许抛却立场,以客观眼光观之,汉宋兼采思想家亦有可取之处。

**关键词:**汉宋兼采思想;章太炎;刘师培;晚清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2-0163-05

汉宋兼采思想因由于“汉宋之争”<sup>①</sup>,乾嘉末年,道咸时期,学界曾一度因为方东澍等人批评汉学而沸反盈天,加之今古文之争,整个晚清学界几无宁日,攻讦、谩骂不绝于耳。而此时亦正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时刻,总结传统学术、寻求中西融合之道已经成为学界首义。在这些努力中,学界颇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气象来:今文经学摭拾西汉余绪,活跃于政治与学术之间;陆王思想乘机而起,大谈御辱之道;汉宋兼采学派则于学术上用力,主张融通汉学和宋学,兼及考据与义理,政治上积极学习西洋科技,响应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学术上鼓吹泯灭门户之争,协力挽救危亡的传统学术。学界对今文经学、陆王学术研究颇多,却惟独忽视了汉宋兼采思想的探索,近年虽有相关成果问世,但是广度、深度皆嫌不足。

乾嘉后期,欧风侵袭,国势板荡,以陈澧、黄以周、朱次琦等人代表的部分学者感慨于汉宋之争的无聊无谓,起而倡导兼采汉学和宋学的新学术方法论。<sup>②</sup>简以言之,便是:弃二者之短,扬二者之长,泯灭意气之争,鼓吹学界共同创新的学术精神。粗略看来,这一思想不过是国难当头时,学界耆宿无力回天的欺人之谈而已。然则,此欺人之谈非彼欺人之谈,这一思想不仅催化了新一代教育思想、学术思想

<sup>①</sup> 汉宋兼采思想实起于明清之际,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周予同注,中华书局,1959年12月)谓:“国初诸儒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说,择善而从。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而在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可见兼采思想在清初便已出现。至于“汉宋之争”,学界仍在争论中,笔者以为暴鸿昌先生的看法比较允当,他说:“清代前期无汉学、宋学之分。乾嘉时期汉学鼎盛,但多数汉学家并不排击宋学,此时宋学衰微,治宋学者已少,鲜有宋学家诋汉学,而诋讥汉学者多文士。道咸以降,虽有方东树等人讨伐汉学,但汉、宋二学调和已成主流,将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概括为党同伐异、仇若水火,岂笃论哉!”(暴鸿昌:《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辨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二期。)<sup>②</sup>“汉宋之争”一词已经为多数学人承认,故沿用此词。

<sup>②</sup> 乾嘉时期,虽然汉学流行,但是不少汉学中坚已经开始关注汉学和宋学的融合问题,如翁方纲云:“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翁方纲:《考订论》)又云“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训诂,然后能讲义理也。”(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七、卷一一。)纪昀道:“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去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四库提要》,“经部总叙”。)阮元云:“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理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互诃也。”(阮元:《国史儒林传·序》)以上可见兼采思想乾嘉时代已经崭露头角。

收稿日期:2010-09-10

作者简介:孙运君(1976-),男,辽宁鞍山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明清学术史。

的诞生,更由于其思想的民主性、建设性而为人称道,相对于后世兴起的“全盘西化”论,“汉宋兼采”思想则是本土学者应对东西方冲突的“土法宝”,当然其中所体现的方法论意义是超时空、超国界的,而这正是它的积极意义所在,也是今人所应学习和提倡的。

然而,兼采学者得到的盖棺之评却颇有不同,以致于人言人殊,学界迄无定论,其中钱穆、梁启超持肯定态度,而章太炎、刘师培则持批评态度。事实上,“汉宋兼采”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或者学术思潮,其意义已经超出学术研究本身,在这一学术活动过程中,许多珍贵的传统思想和价值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其积极意义上讲,“汉宋兼采”对当时的学术革新、教育改革、思想进步诸方面的影响都不可估量。一些重要的学术人物如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等都曾出入“汉宋兼采”思想之门,更妄提一些经学大师如陈澧、黄以周、朱一新等人的积极耕耘。但由于章太炎、刘师培二先生学识淹贯,惊才绝艳,他们的著作流传甚广,评语更是影响巨大,笔者以为会对读者正确理解汉宋兼采思想产生误会。因此拟对章太炎、刘师培二人对陈澧及其汉宋兼采思想的否定评价中不恰当的部分作一申辨,以利学术界清晰地认识汉宋兼采思想。

## 二

章太炎在其《清儒》中云:

晚有番禺陈澧,当惠、戴学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调洽于他书,始勾合汉、宋为诸《通义》(笔者注:即《汉儒通义》)及《读书记》(笔者注:即《东塾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放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以为比类。此犹摘豪于千马,必有其分判色理同者。澧既善傅会,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稍尚记诵,以言谈剿说取人。仲长子曰:“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说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见《意林》五引《昌言》)。”<sup>[1]162-163</sup>

此为章太炎在《馥书》中《清儒》篇所云,其在《检论》的《清儒》篇则云:“澧亦絮行,善教授。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不能传其声律、韵书,稍尚记诵,以言谈剿说取人。及翁同龢、潘祖荫用事,专以謏闻召诸小儒,学者务得宋、元雕槩,而昧经纪常事,清学始大衰。”需要提醒注意的是,《馥书》和《检论》成书时间上,《馥书》在前,《检论》在后,《检论》是1910年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以《馥书》为基础修改而成。

从章太炎的议论来看,他反对陈澧及汉宋兼采思想主要有三点:一,陈澧学问粗陋,是纯粹的蹩脚抄袭者。汉宋兼采不过是断章摘句,生吞活剥,所谓“牵强附会”也。二,所传非人。陈澧忽略了汉宋两家的根本差异,妄图媾和二者,实则是收效甚微,在章太炎眼中,陈澧的学问并不在此,只是他的弟子没有继承他精深的“声律、韵书”之学,仅是学会了“无用”的兼采之学。三,兼采误国。他认为陈澧的思想客观上误导了学术风气,不利于学术发展,“经纪常事”因之而“昧”,清学因之而“大衰”。

从第一点论断来看,章氏此论乃就陈澧《汉儒通义》一书而发,显然是没有理解陈澧著作的真实含义。事实上,陈澧所要阐发的是:汉学并非纯粹是训诂、考据、声韵、文字的专门研究,除此之外,汉学也追求“微言大义”,也重视“义理”的发掘和探寻。在此点上,可以郑玄为突出代表;而宋学同样不止是义理的无限推演,在推演义理、创造价值的前提下,对文字、训诂、声韵等学问同样重视。换言之,真正的宋学是在准确考据的基础上完成的。朱熹可为突出代表。陈澧在阐明这一论点后,提出了学术研究的新创见,即打破汉学和宋学的治学藩篱,杜绝汉学家和宋学家互相攻讦、势同水火现状,二者要互相学习,相互参酌,共同完成“圣道”的求索大业。其次,陈澧的兼采思想论著本身虽然“勾合”了许多郑玄和朱熹治学上的相同点,但是那只是陈澧为了让学人理解其思想的一种手段,而非结果。他要求的结果是汉学家和宋学家抛却门户之见,不要因为汉宋分门异户而在研究活动中对对方的积极论述和重要成绩漠然视之,掩耳盗铃,学者不仅要研究汉学,更要研究宋学,如果仅仅是从事一端的话,那就会离“圣道”愈来愈远,永远处在“资舟车”的繁琐研究中。如其言:“合数百年来学术之弊而细思之,若讲宋学而不讲汉学,则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讲汉学而不讲宋学,则如乾嘉以来之肤浅矣。况汉宋各有独到之处,欲偏废之而势有不能者。故余说郑学,则发明汉学之善;说朱学,则发明宋学之善。道并行而不相悖也。”<sup>[2]</sup>又引朱子言论“朱子云:近日学者意思都不确实,不曾见理会得一事彻头彻尾,东边掉得几句,西边掉得

几句，都不曾贯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不以深为戒也。”<sup>[2]</sup>评价说：“朱子论当时道学之弊如此，然今之说经者，尤多此病。”试想，陈澧尚且反对支离弥缝的学风，他本人又怎么可能蹈前人覆辙呢？章太炎显然没有仔细品味陈澧兼采著作的深意，仅就文字表面，便将陈澧命为“三奸”<sup>①</sup>，这显然是失当的。

从第二点来看，章太炎批评陈澧误导学者，有害学术，同样有失公允。陈澧的思想在当时曾轰动天下，且在其带领下，出现了所谓的“东塾学派”（事实上就是汉宋兼采学派）。作为一种顺应时势的学术思想，其产生必然会引导一大批学者、士人参与其中。人员既杂，自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比如陈澧之门的梁鼎芬。由此看来，自是陈澧之过。但是，历史上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每一种思想都难免会有所谓异端产生，正如章太炎先生一度信奉不疑的辛亥革命同样会混入投机者一样。后来人不能因为末流的异趋而否定创始者的成就，太炎先生显然犯了这样一个错误。这一点陈澧的表现反而要比其批评者更为蕴藉，他在评价陆王心学时便没有因为王学左派的异趋而否认王阳明的学术功绩，更不曾因为否定姚鼐的偏激而否定姚鼐的《九经说》<sup>②</sup>。这些论断不知道太炎先生观后当如何处之。

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就其个性而言，他本人更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 and 独到见解的社会批判现实主义者。因此表现在言论上，往往是人旧我新，人新我旧；人古我今，人今我古；人中我西，人西我中。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就是与众不同，简直是一肚子不合时宜<sup>[3]</sup>。钱基博说章太炎：“顾好盛气攻辨，言革命而不赞共和，治古学而兼称宋儒，放言高论，而不喜与人为同。”<sup>[4]</sup>这些个性决定了章的论断往往具有时效性，不能作为不刊之论。从他在《馥书》和《检论·清儒》中不同表述就可看出，其言清学大衰于陈澧等人的汉宋兼采之学，这显然是一时负气之谈，并不能作为定论。这也是后人论定《清儒》版本取《馥书》而弃《检论》的原因之一。《检论》处处体现了“作者在革命低潮时期的消极情绪”<sup>[5]</sup>。从后人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评价中，我们也能看到他评论问题的某些偏颇和不实。如学者杨国安论述云：当然，他称赞的清儒指的主要只是清代的朴学家，对于清代理学的余波，对于方苞、姚范、刘大魁、姚鼐的所谓“桐城义法”，他都有着深刻的不满。清代理学自然是他不屑多置一词的，桐城派尤其为他所深恶：“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sup>[1]151</sup>对于清代兴起的经今文学派，章氏虽肯定了其中的个别人物，如戴望、王闿运等，但大致持贬斥的态度。他论今文学派的兴起时说：“文士既已熙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sup>[1]155</sup>显然，在太炎眼中，今文经学是不能算作真学问的，不过是文士装点门面的饰物。<sup>[6]</sup>可见，章太炎作为学术批评家，他本身是有立场的。这种立场就是站在朴学家阵营而批评学术，这难免不让我们对其给予其他阵营学者的评价提高警惕。陈澧等汉宋兼采学者表彰宋学，奖掖王学，这显然会干章氏门户大防，其在论著中对汉宋兼采思想作如此之议论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梁启超对章太炎的点评可谓此一观点的最佳注脚，梁说：

炳麟中岁以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界者亦甚巨。虽然，炳麟谨守家法之结习甚深，故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如治小学排斥钟鼎文、龟甲文，治经学排斥“今文派”，其言常不免过当。而对于思想解放之勇决，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也。<sup>③</sup>

### 三

章太炎之外，刘师培在他的论著中也提到了陈澧。他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云：“澧学钩通汉宋，以为汉儒不废义理，宋儒兼精考证，惟掇引类似之言，曲加附和，究其意旨，仍与摭拾之学相同，然抉择至

① (汉)仲长统：《昌言》中语，意在甄规学术风气，醇正教化，太炎先生引用词语乃在于讥刺陈澧学无根基，牵强附会，有违学者本色。

② (清)陈澧谓：姚姬传《九经说》，实有家法，过望溪远甚。虽《学海堂经解》不收，要自可传。（(清)文廷式：《陈兰甫先生语录》，王青垞主编：《安雅》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上，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一日。）近人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转引此条，并云：“鼐之治经，主于融会众说，不为墨守之学，所规不同，义各有当，又何必持当时经师偏重故训之习，厚相诘难乎？善夫陈澧之言。”陈澧又谓：“姚姬传抵汉学家如此（指《题外甥马器之长夏校经图》），而所著《九经说》、《三传国语补注》及笔记，则与汉学家考据训诂者无异，可见说经必当如此，姬传故不能自异也。”（(清)陈澧：《陈澧集·东塾杂俎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63页。）

③ (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2000年第三次印刷，第96页。启超为今文家，太炎曾与之齟齬，此处引梁氏语似不妥，然比照前揭诸例，则梁氏所论当属实，且梁氏论学尚称允当。

精，便于学童。”<sup>[7]</sup>又在《清儒得失论》中云：

道光中叶，清室之臣有倭仁、吴竹如，以程朱之学文其浅陋。别有山阳潘德舆、顺德罗敬珩、桂林朱琦、仁和邵懿辰，以古文理学驰声京师，其学略与方、姚近。曾国藩从倭仁游，与吴、潘、邵、朱友善，又虑祈门诸客学出己上，乃杂治汉学，嗣为清廷建伟勋，后起之士竟从其学。……浙学自阮氏提倡后，定海黄式三亦学兼汉宋，其子以周继之，然实事求是，不侈空言。广东学者惟侯康为最深醇，其次有南海朱次琦、番禺陈澧。次琦笃信宋学而汉学特摭摭及之，澧学钩通汉宋，掇引类似之言曲相附和。黄氏蛰晦，不以所学目标，朱陈稍近名。各以其学授乡里，然束身自好，不愧一乡之善士。惟学术既近于模棱，故从其学者大抵以执中为媚世。自清廷赐澧京卿衔，而其学益日显。<sup>[8]</sup>

从刘师培的议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几点意见：一，他批评陈澧曲言附和，仍将其归于汉学末流。二，认为从学陈澧、朱次琦的学者大都是趋炎附势、媚世之徒。三，认为曾国藩的汉宋兼采之学起因于学术攀比。第一点论调与章太炎相似，姑不繁论。第二点，其言跟从陈澧、朱次琦等人学习的人多数是媚世小儒，这与章太炎在《检论·清儒》中所论相类。事实上，章、刘二人所指的“媚世”小儒主要是指于式枚、梁鼎芬和文廷式三人。而事实上，这三人虽然从学陈澧，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继承陈澧的学问，文廷式曾为光绪帝珍、瑾二妃的家庭教师，学术上不为训诂，亦不为宋学，“独攻墨庄”，史载文廷式“探其义旨，动得窍要”。因为他醉心墨庄，“文工骈俪、散体”<sup>[9]</sup>，因此行动轻狂，放浪形骸，对于“儒术”多有谤词，因此不为时代所容。但是他的确是学行有亏，因为他自以为是后妃老师，以为宫中有大援，因此“将跻权要，无识者或趋附之，竟为声气主盟。”可见文廷式确曾借势风光一时，但是好在“观其湮没所为词，有悔心矣”，尚算可以理解。文廷式所以得到恶声，大致究因于此。

于式枚也肄业于学海堂，但是他所为的是词章之学，并非经学考证，他所以不为世人所容乃是其参与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归国后反对立宪，认为“立宪必先正名，不须求之外国”，请愿早开国会为“胥动浮言，几同乱党”，因此为清议所不容，以至于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谢天下。”<sup>[10]</sup>清廷谕令将陈景仁即行革职，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并查禁政闻社。于式枚大致获罪于此。

梁鼎芬则是肄业于菊坡精舍，任官初期尚能主持正义，因为弹劾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处置失当而被议处，从此获得“直言”名声。但是好景不长，其后便先后镇压武昌起义，抵制革命，阴谋打击学生，因此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此三人是陈澧弟子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也可说是陈澧教学获谴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三人中并没有一人专心从事经学研究，更妄提汉宋兼采之学，文廷式和于式枚以文学著称，梁鼎芬更是“以留得人间几首诗”而沾沾自喜。可见说三人为陈澧弟子应该没错，毕竟双方具有师生关系，但若说三人是陈澧的入室弟子，则大谬不然，因为陈澧的入室弟子并非此辈，今日看来当是桂文灿、简朝亮等人。此外，文廷式学行有亏，于式枚获罪是因为政见不同，梁鼎芬为人鄙陋虽然与陈澧教学有关，但是让陈澧等汉宋兼采学者来负此责，是否过于牵强？

且刘师培论学，明显偏袒汉学家。朱次琦、朱一新等人批评汉学家党同伐异，趋附声气，本为确论，但是刘师培却议论说：

故汉学之儒均学究曲奥，全身远害，以晦其明。即焦黄以暴行施于乡，段氏以贪声著于世，然志骄而不卑，行横而不鄙，以之为民蠹则有余，以之败世风则不足。而朱次琦、朱一新之徒，或以汉学为趋声气，抑亦思近世之趋声气者，果醇为汉学之儒乎，抑亦以金石校勘词章济之者乎？夫必以金石校勘词章相济，则知趋声气者故在彼不在此。……况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外逞匡时化俗之谈，然实不副名，反躬自思亦必哑然失笑。<sup>[11]</sup>

晚清之时，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宋学家，抑或是汉宋兼采学者，任何一个阵营内都有学行有亏的学者存在，朱次琦、朱一新对汉学末流的评价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刘师培在此点上忘记了学术批评的根本原则，以汉学家的身份为汉学正名，显然有偏颇之见。些外，刘师培一度趋附端方，驱逐章太炎，叛变革命

党,气节与人格皆遭诟病,因此说此论确实不妥。

至于第三点,他认为曾国藩研究汉学,主张汉宋兼采是缘于学术攀比,他用了一个“虑”字。刘师培与曾国藩不是同时代人,曾国藩卒于1882年,刘师培生于1884年,生活时代完全没有交集,试问,曾国藩之“虑”,刘师培何得而知?此外,就曾国藩所学来看,后世学者甚乎将之比之为汉宋兼采健将,足见其学术造诣岂能一言一词便能概括?再次,无论从政治考量,还是从学术考量,甚而从自身利益考量,曾国藩作为晚清学术名家,他学兼汉宋与否都有其正当理由,背后皆有原因,不可以学术攀比衡量的,因此说这显然是刘师培的诛心之论,故不必深论。

## 四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章太炎和刘师培二人在对待汉宋兼采思想这一问题上,见解略见狭隘,对汉宋兼采思想的批评并不全面。二人站在古文经学立场之上,章氏以汉宋兼采思想为“三奸”,刘氏命之以“曲相附和”,认为兼采学者“近名”,从之学者“媚世”等等皆非确论。此一风气直至钱穆誉陈澧为“经师”方始改变,而笔者所以断断不休地分析此事,乃在于章、刘二人之评价对后世影响过巨。章氏以后,众多学派都与此评论牵涉甚广,因之不得不着墨剖析,以为汉宋兼采思想正名。当然,章、刘二人为学术大师,见解独到,即便小疵,亦不掩大德,笔者所论不过一孔之见,敬请方家纠正。

### 参考文献:

- [1] (清)章炳麟. 廛书详注[M]. 徐复,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2] 杨寿昌. 陈兰甫先生遗稿[J]. 岭南学报,1932,2(3):174-214.
- [3] 吴稚晖. 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M]//张枏,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北京:三联书店,1977:212.
- [4] 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魏晋文·章炳麟[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72.
- [5] 章炳麟. 廛书·廛书评价[M]. 刘治立,评注.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4.
- [6] 杨国安. 惊世之论,有为之言——章太炎《廛书》(重订本)论学术史部分评析[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69-72.
- [7] 刘师培. 刘师培学术论著[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59.
- [8] 刘师培. 清儒得失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67.
- [9] 沃丘仲子. 近代名人小传·儒林[M]. 北京:中国书店,1988:10.
- [10] 丁文江,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468.
- [11] 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774.

责任编辑 张颖超